



闽南话

的形成发展及 在台湾的使用

MINNANHUADEXINGCHENGFAZHANJI
ZAITAIWANDESHIYONG

周长楫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闽南话

的形成发展及 在台湾的使用

MINNANHUADEXINGCHENGPAZHANJI
ZAITAIWANDESHUYONG

周长群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闽南话的形成发展及在台湾的使用 / 周长楫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 - 7 - 5068 - 1912 - 1

I. 闽… II. 周… III. ①闽南话—方言研究—福建省
②闽南话—方言研究—台湾省 IV. H17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8204 号

责任编辑 / 金 硕

责任印制 / 熊 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 / 北京祖龙盛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2(总编室) (010)52257154(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7.75

字 数 / 193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引言

汉语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变体。汉语方言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它是语言发展变化的一种结果。就社会历史和地理条件而言，方言的形成跟社会的分化，人口的迁徙、扩散、流动及民族的融合和山川的阻隔等原因是分不开的；就语言本身来说，方言的形成是语言内部的各种矛盾在其不平衡的发展变化过程中所造成的时地差异不断扩大的结果，有些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变化还跟其他语言或方言的相互渗透、影响、融合甚至同化等是分不开的。

闽南方言，也叫闽南话，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变化比较缓慢、流播地域比较广的汉语方言。研究闽南话的形成和发展变化，必须先了解古闽地闽越等土著民族历史情况的基础上，联系与闽地相邻的吴、楚两地方言与文化对闽地语言与文化的影响，同时认真考察北方汉人因避战祸、逃荒等等原因，自上古时期的汉魏开始直至唐宋时期，多次从北方大批地迁徙至闽地的闽南地区，并在这个地区逐渐形成一个民系，同时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古汉语及汉文化一起带入闽地，在与闽地闽越等土著民族的交流、融合和同化过程中形成以中原汉语及其文化为主体的汉语方言。据此，我们认为，闽南话的孕育应在汉魏时期，至少在南北朝已初步形成。早期的闽南话是包容在一个统一的闽语里。这个闽语可能从唐宋开始由于各种原因才逐渐分化成为如今天人们所

说的闽东方言（福州话）、闽北方言（建瓯话）、闽中方言（永安话）、闽南方言（厦门话）。有人主张还应再划一个莆仙方言（莆田话），但我们认为莆仙方言也是闽南话的一个分支。在闽语后来分化的几个方言里，闽南话在语音、词汇等方面，都应比闽语里其他几个方言保留着更多古汉语的成分。

唐宋时期的闽南话已趋成熟，并从宋元开始逐渐分化。这种分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闽南话及其文化走出了闽南地域的小圈子。它随着闽南地区的移民向外地区和外省扩散，甚至远涉重洋，在南洋各地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流播和发展，并在这些地区落地生根。在各地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下，流播在外地、外省甚至南洋与世界各地的闽南话，大多是福建闽南话的一个分支，少数是福建闽南话的方言岛。它们与福建的闽南话相比，既有共同的特点，又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可以说，时至今日，闽南话已是一个超地区界、超省界甚至是超国界的汉语方言了。

本书主要讨论的是福建闽南话与台湾闽南话的关系。汉语方言的形成跟人口的迁徙有着重要的关系，因此，在论述福建闽南话与台湾闽南话的关系时，笔者首先简述闽南地区大批移民带着祖籍地闽南话和闽南文化迁徙入台扎根的历史，特别通过有关谱牒的对比，说明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与福建闽南地区的人民是同祖同宗同源的。接着笔者又以大量的语言事实，分别从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入手，通过比较与论述，说明源于福建的闽南话，流播到台湾形成台湾闽南话后，如何在台湾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形成了所谓“漳泉滥”的特点，但与福建闽南话仍有90%以上是相同的，差异点只有10%左右。就是说，台湾闽南话与福建闽南话之间的共同点大大超过了它们之间的差异点。顺便提及，福建闽南地区厦门、泉州、漳州三地闽南话之间的共同

点与差异点也在 90% 与 10% 左右。跟流播至广东潮汕地区、雷州半岛地区以及海南省的闽南话相比，台湾闽南话跟福建闽南地区的闽南话最接近，两岸百姓用闽南话通话并无障碍。

闽南话是闽南文化的载体，闽南话表现闽南文化，闽南文化依存于闽南话。本书最后通过闽南、台湾两地区文化中几个主要方面的对比，再次证明闽南、台湾两地区的文化习俗也是十分相近的。这样，通过对闽南移民史的概述以及闽台两地闽南话及其文化的对比等多方位、多角度的考察和分析，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台湾闽南话及其文化确实实是源于福建闽南话与闽南文化的，是福建闽南话及其文化的一个分支。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古闽地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1)
第一节 古闽地与古闽越族	(1)
第二节 古闽越族的语言	(2)
第二章 汉人入闽与闽南话的形成发展	(6)
第一节 汉武帝发兵入闽和闽越族的北迁	(6)
第二节 三国时期东吴五次进军闽地	(9)
第三节 两晋南北朝北方汉人再次入闽与闽南话 的形成	(11)
第四节 唐初的“蛮獠啸乱”与陈元光的入漳	(21)
第五节 宋代北方汉人的入闽	(26)
第六节 唐宋时期的闽南话概貌初探	(29)
第三章 闽南话的向外传播	(46)
第一节 闽南话在福建省内的分化	(46)
第二节 闽南话向省外的传播	(50)

第三节 闽南话向海外的发展	(56)
第四章 台湾闽南话的形成	(62)
第一节 台湾的居民与语言	(62)
第二节 明清时期闽南地区汉人入台简述	(68)
第五章 台湾闽南话与福建闽南话的比较	(92)
第一节 语音的比较	(92)
第二节 词汇的比较	(149)
第三节 语法的比较	(192)
第六章 闽南地区与台湾地区民俗文化的比较	(209)
第一节 岁时节日民俗	(209)
第二节 人生礼俗	(218)
第三节 民间信仰	(224)
第四节 民间戏剧与文学	(229)
附 录	(233)
闽南话常见训读字举例	(233)
闽南话常用同音字举例	(234)
闽南话常用方言字举例	(235)
后 记	(236)
主要参考文献	(238)

第一章 古闽地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第一节 古闽地与古闽越族

“闽”是福建的古称。《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所云“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中的“七闽”跟古闽地有些不同。“七闽”分布的地域很广，除了包括今天的福建全境外，还包括了广东的潮梅地区以及今浙江省古为温、台、处的三府地带等。

根据各种史料的相互印证和一系列出土文物的判断，多数学者认为，远古时期居住在福建这个地区的先民，应属于古百越的一个分支——闽越族。《说文解字》说：“闽，东南越，蛇种。”这是说闽越族就是拜蛇图腾的东南越，他们是福建这个地方最原始的土著民族。从古代有关的典籍记载中可以得知，至少在商周时期，居住在南方的百越各部落，跟中原华夏族已有较密切的联系。

《史记·东越列传》记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

《四库全书·百越先贤志提要》也说：“南方之国越为大，自勾践六世孙无疆为楚所败，诸子散处海上。其著者：岭南为南

越；自东冶至漳泉为闽越；永嘉为瓯越；自湘漓西南为西越；牂牁西下邕、雍、绥、建为骆越。统而名之，谓之百越。”

《读史方輿纪要》引林圻《闽中记》道，越亡于楚后，其子孙徙居越迁山（今福建长乐市东北）。

可见，闽越族和春秋时代越国的越族，是同一渊源，关系十分密切。

从有关的典籍史料可以得知，春秋战国时代的吴、越，是地域相连、语言相通、习俗相同的同族而异国。它们跟中原华夏族及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目前考古所能提供的材料看，福建这个地域有不少新石器时代的遗物遗迹，如福清市东张的山坡遗址，闽侯甘蔗昙石山、白沙溪头和榕岸庄边等地的贝丘遗址，都是距今有 5000 年历史的原始的地方文化类型。金门县发现的篦点纹陶器，跟中原地区发现的裴李岗文化的篦点纹陶器相似。至于武夷山的船棺等，以及福建各地陆续出土的几何印纹硬陶等遗物，都证明了早在夏、商、西周时期，福建这个地区的先民活动，已经是相当活跃的了。

第二节 古闽越族的语言

古闽越族的语言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呢？历史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古闽越族语言的文字材料。有关古闽越族语言的面貌，我们只能从史籍的零星记载以及今闽语的一些方言和地名等材料里扒拉、追寻和捕捉古闽越语的一些踪迹。

例如，西汉刘向所著《说苑·善说》记载了春秋战国时代楚国令尹鄂君子晰在游船上赞赏榜枻越人歌唱越歌的生动故事。这首著名的《越人歌》当时曾用汉字记录下来，并作了翻译。

歌辞曰：“滥兮扑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饌。州焉乎秦胥胥，纍予乎昭澶秦逾渗。（这句缺记音），悵随河湖。”用当时的古文翻译是：今夕何夕兮攀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叶，心悦君兮君不知。可见越语与汉语是不同的。近年来，有学者把《越人歌》的汉字记音标注成上古音（用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的拟音），然后跟今天的壮语词进行比较，发现它们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可能当时就都属于古壮侗语族。记载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吴越历史的重要典籍《越绝书》里，也记录了一些越语词，如把“船”叫“须虑”，把“海”叫做“朱余”，把“石头”叫做“尘”，等等。同样，这些越语词跟壮语也有密切联系。

地名是整个语言符号体系中一个特殊的符号，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地名，寻找到古代闽越族地理概貌和移民史的重要痕迹和文化特征。李如龙《地名与语言学论集》认为，福建含“拿（那）”、“畚”、“排（牌）”、“寮”用字的地名就是壮侗语族中一些语言（包括古闽越族语言）留下的痕迹。“拿”在壮侗语族的一些语言中是“水田”的意思，今壮侗族语族的壮语、布衣语、傣语的读音“na”，福建闽北地区就有14处地名用“拿”字，如邵武的拿口镇、拿口溪、拿口村、拿口街、拿上村、下拿坑，建阳的拿厝村、拿坑村，崇安（今武夷山市）的大拿村、青山拿村等。“畚”在壮语、布衣语和傣语的一些地方读“lom, lam”，是烂泥田或下陷义。在闽南地区，“(lom, lam)”就是烂泥田的意思，也做动词，表示“下陷”的意思。福建以“畚”做地名的也多达22处，其中闽南就有十多处，如南靖的后畚底村、畚仔底村、畚顶水库、畚底林场、大邦畚等，龙海的加畚坑村、畚山底水库等，华安的畚尾

村，云霄的畚坪村、后畚村等，平和的畚里村等。再如“排（牌）”，在壮侗语族中一些语言里是“山”的意思，福建保留“排”这个地名的有 525 处之多，分布在闽西、闽北、闽中、闽南等地区。如宁化的黄泥排，邵武的大排，浦城的牛场排，长汀的杉树排，建宁的黄土排，光泽的排边，将乐的王厝排，清流的铁坑排，上杭的茶排里，建阳的九仙排，永定的洋头排，顺昌的九龙排，武平的枫树排，明溪的烟林排，厦门鼓浪屿的五叶排，等等。“寮”多指用茅草之类搭盖的简易棚子、屋舍，福建以“寮”做地名的也多达 368 处，主要分布在闽南、闽西和闽北等地区。如南安的顶寮、山寮，南靖的田坑寮、拍铁寮，龙海的鸭母寮、内寮，华安的白鹤寮、和尚寮，漳州的船寮、草寮街，诏安的麻寮、军寮，漳平的牛寮顶、路寮，泉州的茶寮、后寮，连城的田寮、谢尾寮，上杭的牛寮背，清流的竹瓦寮，武平的板寮，等等。

畬族是福建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关于畬族，目前学术界的意见还不一致，有“山越”说、“长沙武陵蛮”说和“南蛮”说等，不管哪一说，大抵都不否认它与古百越族的关系，很可能跟古闽越族有关系。福建带“畬”字的地名几乎遍及八闽，有 224 处之多，如永泰的长畬，屏南的葛畬，连江的利畬，宁德的葛畬，邵武的杨家畬，顺昌的芒畬，建宁的珠家畬，清流的林畬，宁化的洋畬，三明的吉畬，永安的浮流畬，沙县的谷畬，尤溪的下畬洋，明溪的芗畬，南平的曹畬，崇安的上畬，浦城的平畬，建瓯的下畬洋，松溪的乌木畬，政和的畬头，建阳的上畬亭，武平的黄心畬，连城的胡畬，长汀的新畬，上杭的坪畬，永定的大畬，龙岩的小高畬，漳州的后畬，华安的官畬，南靖的大林畬，平和的畬坑，诏安的大畬，云霄的上梨畬，德化的仁根畬，安溪的崎畬，南安的畬厝，同安的荏畬，惠安的雷畬，长泰的土畬，

晋江的畚店，等等。

还有闽语各方言里的一些词语及某些构词法，从汉语或汉语诸方言里难于考证出来。其中有些词语或构词法很可能就是古闽越语与汉语交融过程中留下的遗迹。如闽南话词语里的“肉”叫“bah⁷”，“精液”叫“siau²”，“女阴”叫“tsi¹ bai¹”，“要”叫“beh⁷”，“猛扑”叫“sāh⁷”，“裂开”叫“pit⁷”，“身子高长”叫“lo⁵”，“凹陷状”叫“nah⁷”，等等。还有大多数动物的雌雄性，在构词时都把“公（哥、角）”、“母”等特征区别词放在动物后，跟现在汉语不少方言是把“公”、“母”这些特征区别词放在动物前面是不同的，如猪哥（公猪）、猪母（母猪）、鸡角（公鸡）、鸡母（母鸡），等等，这些很可能就是古闽越语及其所属语族、语支的其他语言的构词特点。

第二章 汉人入闽与闽南话的形成发展

第一节 汉武帝发兵入闽和闽越族的北迁

秦王朝的暴政，引发了由陈胜、吴广领导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闽越王无诸和东瓯王摇见势也加入了反秦的行列。秦朝便在反秦的熊熊烈火中灭亡。为奖掖闽越王无诸和东瓯王摇在反秦中的表现，新建立的汉王朝仍立无诸为闽越王，建都东冶，立摇为东海王，号称东瓯王，建都东瓯，让他们继续分别统治闽和东瓯这两片地域。

不久，闽越王无诸的势力日益强大，便开始向外扩张，北袭今江西余干等地，南侵今广东梅州、潮州地区，东则犯东瓯越。由于东瓯越无力抵抗，东海王摇便请求汉王朝将东瓯百姓尽数迁徙到今江淮一带居住，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闽越王无诸如此嚣张的气焰，自然激怒了汉武帝，于是汉武帝准备发兵南下入闽。当时，汉武帝的叔叔淮南王刘安曾以闽越地之险阻，闽越民之强悍，以王朝区区少数之军入闽恐难对付等情势为由，紧急上书力劝汉武帝止戈息兵。有关刘安上书的情况，《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岩终王贾传》有详细记载。只是，胸具雄略大志的汉武帝不听劝谏，遂令发兵入闽，讨伐闽越王无诸。果然汉兵一压闽越之境，遂引起闽越族的内讧。经过一段时间的平乱，汉武帝终于统一了闽越，并

“诏军吏将其民徙处江淮间”。

汉廷虽然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将闽地的闽越族迁徙到北方江淮一带，但这只能把闽越族的贵族高层、军队以及一部分百姓带走，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百姓是不愿意跟着走的，当汉兵入境时，一些平民百姓就闻风而逃，有的可能跑到深山老林里暂时躲避一下，希望躲过这阵风头之后再返回故地，有的则可能离开原住地而迁徙到其他地方去安居。这个常理，我们可以从《宋书·州郡志》的一段记载得到证实：“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逃遁山谷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汉书·地理志》也记载了在当时的会稽郡下确实有个冶县的地名。可见，在汉廷的迁徙风暴过了后，那些暂时逃遁到山谷森林里的闽越族平民，甚至可能包括一些迁到外地居住的闽越族平民，在打听到已经没有什么事后，就陆陆续续返回了家园，而且人数不会太少，不然，汉王朝怎么会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属于会稽郡管辖的冶县，来治理这些遗民呢？

今闽北地区发现多处汉城遗址和汉代遗物，为汉代在闽地建县并实施真正的统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如闽北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发现的汉城遗址，实际上就是早期闽越王的宫殿。从中出土了许多文物，如陶器、鼎、盒、釜、盅等，都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文物还刻有如“河内工官”、“常乐万岁”、“乐未央”等铭文，字体风格与西汉中后期相像。王莽时期，曾把京都“长安”改称“常安”，“长乐”改为“常乐”等，所以“常乐万岁”就是“长乐万岁”。至于“河内工官”，根据《汉书·地理志》载，河内郡的郡治在怀县，其下注“有工官，莽曰河内”。1958年和1976年，考古学者先后在闽侯县荆溪庙后山与福州洪塘金鸡山发现两座东汉时期的土坑墓，出土的陶罐、陶壶、陶灶和铁釜、铁剑、铜镜、货泉等等文物，陶器上有的施青

绿釉，这说明汉人与汉文化已经进入闽地了。

历史文献没有给我们留下当时入闽汉兵的数目，也没有记载被迁徙到江淮间闽越族的人数和汉廷在闽地设置冶县后闽越族平民的数量。不过，从刘安上书所提到的“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的话语里可以知道，虽然刘安对当时闽越军队的数量估计不一定准确，但从无诸王能对四邻进行军事扩张的情况分析而作最保守的估计，闽越族的军队至少也有十万八万以上吧。汉兵入闽地的人数别说要多五倍，只要以多一倍计算，也至少该有二三十万吧，否则要怎么完成平叛闽越并把闽越族相当数量的贵族、军队和百姓迁徙到江淮之间的任务呢？一部分入闽的汉兵应当肩负随监押迁徙到江淮间的闽越族而离开闽地，但也要有一定数量的汉兵留下来驻守在新设置的冶县以便治理闽越族的遗民。以常理推论，在正常的情况下，驻军的数目一般要比驻地的平民百姓少的。所以，不管留下来的遗民是多少，他们总要比驻地的汉兵多。这些闽越族遗民所使用的语言自然是自己的母语——古闽越语了。关于闽越语，上面已作了介绍。可以肯定地说，古闽越语跟北方汉人说的语言是相差较大的。入闽汉兵（多数来自北方）所说的语言跟闽越族遗民之间的沟通肯定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虽然这时候入闽的汉兵汉人仍占少数，闽地闽越族的人数及其语言和文化仍占着优势的地位，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些来自北方和吴楚两地的汉兵汉人所带来的北方和吴楚两地古代的先前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对闽越族遗民肯定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汉代的闽地，已经有了不同语言与不同文化的交流，即汉人所带来的北方古汉语和吴楚等方言及其文化跟本地闽越族语言与文化的相互接触、交流，并在相互的交流中逐渐融合。

第二节 三国时期东吴五次进军闽地

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再起，之后形成了半个多世纪的魏、蜀、吴的三国鼎立。

在江东崛起的孙吴，为了开拓疆域，扩充实力，巩固政权，以抗衡魏、蜀，曾先后于建安元年（196年）、八年（203年）、十三年（208年）、嘉禾四年（235年）和太平二年（257年），共五次发兵征战闽地。第一次进兵闽地，就占领侯官（今福州）；第二次进军闽地，“郡发属县五千兵，各使本县长将之，皆受（贺）齐节度”，先后打败了闽地反吴的几股势力，确立了孙吴在闽江流域的统治；第三次发兵闽地，由吕岱为督军校尉，与将军蒋钦等合作，消灭了会稽东冶的吕合、秦狼的反叛，平定了东冶五县；第四次用兵闽地，使东吴“得恶民以供赋役”；第五次发兵入闽，镇压了建安等地的“山越”动乱。经过五次的用兵和前后数十年的经营，孙吴政权基本上巩固了其在闽地的统治，并于永安三年（260年），在闽地设立了建安郡，辖建安（今建瓯）、南平、将乐、建平（今建阳）、东平（今松溪）、昭武（今邵武）、吴兴（今浦城）、侯官和东安（南安）等九县。就是说，今闽北和闽江流域一大片地域以及闽南一些地区，都在当时孙吴政权的统治之下。

这个时期的闽地，经济也有相当的发展。特别是孙吴政权把福建作为它一个重要的造船基地，永安年间（258—264年），在东冶设置了典船校尉，在侯官还兴建了一定规模的船坞。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人口迅速地繁衍增加。虽然《宋书·州郡志》记载至永安三年（260年）有3024户计17686人，但可以肯定这个数字跟实际的情况相差甚大。近人的研究数字相